

收稿日期:2023-02-15

南朝陵墓石刻艺术及其在中外交流中的民族特征

尚荣

(南京大学哲学系,江苏南京 210093)

摘要:石刻始见于南阳,后传至襄阳,并随国家文化政治中心的转移而至建康。南朝陵墓石刻初融合秦代装饰写实与汉代雄浑写意造型风格,之后不断吸收波斯文化和佛教文化艺术形式,在不同文化艺术持续频繁的交流中形成其经典造型。南朝陵墓石刻具有民族装饰化、调和折中化、中外融合性等艺术风格。南朝陵墓石刻承袭了传统艺术,并积极汲取北方和海外的艺术风格,创作题材得到了拓展,传统技法得到进一步丰富,这对后世石刻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南朝;陵墓石刻;艺术风格;中外交流;文化特质;民族特征

中图分类号:J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23)03-0109-07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江苏雕刻遗存类型风格及其艺术价值研究”(21VSB026)。

作者简介:尚荣(1978—),男,江苏东台人,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和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研究。

DOI: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23.03.044

南朝陵墓石刻是指南朝时期置于帝王陵寝前的墓道石刻,以石兽、石柱、石碑最为常见,其中石兽雕刻最为典型。其形制上承秦汉,下启隋唐,气势雄壮恢弘,造型夸张而不失灵动,是魏晋南北朝个性解放的时代反映。从发展轨迹来看,石刻的传播痕迹清晰。石刻始见于南阳,后传播至襄阳,接着随国家文化政治中心的转移,逐渐从洛阳传至建康。南朝陵墓石刻融合秦代装饰写实与汉代雄浑写意造型风格,在之后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波斯文化和佛教文化艺术形式,最终发展成为世人所见的南朝陵墓石刻艺术瑰宝。

一、南朝陵墓石刻形成的历史文化背景

南北朝时期,国家处于战争频繁、时局混乱的状态。但从社会进步和艺术发展的角度来看,总体上这一时期仍处于繁荣发展的阶段。南北朝时期在民族融合、经济发展、政治制度和文学艺术等方面都呈现出上承秦汉魏晋,下启隋唐五代的过渡性状态。

自魏晋以来,北方便出现数次民族大迁移和南北文化融合的过程。北魏孝文帝大力推行汉化改革,在此影响之下,北方地区的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封建政权制度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各民

族交流融合程度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北魏末年,鲜卑贵族生活腐化,政治衰败,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由此爆发了多个民族冲突。在这些冲突过程中,民族融合的进程加快。北方的鲜卑、羌、氏、乌桓、匈奴、羯等各少数民族在与南方汉民族的交流中,文化得以融合发展,其文化也成为中华文化渊源之一。魏晋时代,南方地区除了汉族之外,越族、蛮族等少数民族的发展规模也逐步壮大。南朝时期,汉族和蛮、僚、俚等民族之间,通过战争、赋税、迁徙、错居、联姻等途径,产生了密切的联系与交流,我国多民族不断融合发展。到了南北朝后期和隋唐之际,少数民族与汉族相处已十分融合。因此可以说,魏晋至南北朝这一时期,是战乱迁徙和民族融合的关键时期,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和时代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相较北方的少数民族,当时的汉文化更为先进,政治制度也更适应社会的发展,因而成为其他民族学习和吸收的范式,这是由封建制度所决定的,也是南方各民族发展的转折点。

南北朝时期,相较于北方社会经济面临严重破坏的处境,南方却有着较为突出的发展,相对稳定的社会局势和适宜的自然条件等无疑成为了当时我国经济重心南移的重要条件。这一时期南方社会经济之所以有着较大的发展,其中极为重要的因素便是北方人口的南迁和少数民族移居平原。南方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吸引着处于战乱中的北方人民。《隋书·食货志》说:“晋自中原丧乱,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并谓之侨人。”^[1]在京师建康,这类人就相当多。当时北方的民族矛盾发展成为社会主要矛盾。多数南迁民族的社会发展一般落后于汉民族的发展,有的还处于野蛮时期的后期,经济与生活的方式与汉族也有差异。《南齐书·州郡上·南兖州》序文载:“时百姓遭难,流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2]当少数民族入主北方以后,难免会将落后的统治方式带入中原,而统治者们的加剧了民族之间的矛盾,如建立后赵的石勒就称羯人为国人,放纵他们欺凌汉族和其他民族等。由此导致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促使汉族人民更向往南方的正朔,把南方的统治者看作自己的官家,只要少数民族政权崩溃或失去控制,北方人民便会蜂拥至南方。

从汉代的三公九卿制到唐代的三省六部制,这一政治制度演变主要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这一时期由于封建割据和长期动乱而导致政府机构不断变化,但并不影响这一时期政府机构的组织及其演变具有明显的承上启下特点。杜佑在《通典·职官四》中载:“魏晋以下,任总机衡,事无大小,咸归令仆。”^[3]尚书省的出现起始于魏,而到南北朝时,其内部组织逐渐向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央政治体制发生变化的重要过渡阶段,尚书、中书、门下三省体制在这一时期逐渐形成。从汉代的三公九卿制演变到唐代的三省六部制,这反映了我国古代政治制度的进步。当然,在一定程度上南朝政局相对于北朝较为安定,各个朝代均开展了颇具规模的开发,大力推行劝农政策、招集流亡、奖励耕垦、兴修水利、减轻赋役、赈济灾民、发展生产。这些发展措施助推了南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南方人口大幅上涨。闽江、珠江流域在商业、手工业方面的发展最为明显,而江南地区的开发对我国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到陈朝时,江南已是“良畴美柘,畦畝相望,连宇高甍,阡陌如绣”^[4],是当时全国经济最为发达的新开发区域。正是这些新经济区域的开发,为全国经济重心的逐渐南移和隋唐经济文化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另外,从文化上看,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与佛教的融合,对汉民族原有的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为后期儒、释、道融合发展奠定了基础。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各阶层或多或少受到了佛教的影响。与魏晋诗人不同,南朝诗人更崇尚声色,追求艺术形式的完善与华美,梁萧子显所云“若无新变,不能代雄”^[5],就是对当时士人追求新变趋势的高度总结。

南朝宋之后,描写山水景物的诗歌开始盛行。谢灵运开创的山水诗以及鲍照的乐府诗表达了广大寒士的心声,开启了南朝一代新的诗歌风貌。南朝史学方面,纪传体在角力中再次占了上

风,成为重要的史书体裁,从而确立了纪传体史书在古代史学中的正史地位。南朝画界人才辈出,宋代陆探微“笔迹劲利,如锥刀焉,秀骨清像,似觉生动”^[6],是继东晋顾恺之以后较有成就的画家。梁代画家张僧繇则以寺院壁画创作为主,相传他作安乐寺四白龙壁画时,对其中二龙进行了点睛,随即这二龙就飞上了天,这就是“画龙点睛”典故的由来。这一时期,绘画理论也达到了较高水平,齐代谢赫在其《古画品录》中,对作画六法进行了精辟论述,其画论被后代画家所推崇。南方经济的迅速发展,有力地促进了文化艺术的发展。现在仍然存世的南朝石刻,是中国古代艺术宝库中的珍品。而石窟寺、陵墓神道的石刻艺术则是承袭了汉代传统艺术,并积极汲取北方和海外的艺术风格,创作题材得到了拓展,传统技法进一步丰富,对后世石刻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总体而言,这一历史时期是在曲折中发展,在破坏中建设,在分裂中融合,并在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下寻找到了新的切合点。对中国发展史而言,这一时代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是具有独特历史地位的关键时期。

二、南朝陵墓石刻的艺术风格

南朝陵墓石刻体型巨大、纹饰精美、气势雄伟,在雕刻艺术上独树一帜,体现了古代匠人的高超技艺与手法。南朝陵墓石刻主要有麒麟、辟邪、石柱、石碑等,散布于建康辖域内(现南京栖霞、江宁及南京附近的句容、丹阳等县市),陵墓石刻基本上都放置在陵墓的两侧,以辟邪、麒麟等石兽最为引人注目。梁思成在《中国雕塑史》中对南朝石刻有极高评价:“在此谨言之中,乃露出一种刚强极大之力,其弯曲之腰,短捷之翼,长美之须,皆足以表之。”^{[7]59}南朝陵墓石刻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其纹饰、造型、碑文、形制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最早对南朝陵墓进行调查与研究的当属清代的莫友芝,其所著《金石笔谈》记录了南京栖霞地区的南朝陵墓石刻。《梁代陵墓考·六朝陵墓调查报告》汇集了民国年间出版的研究南京和周边地区六朝陵墓及神道石刻的两种专著,不仅对当时发现的六朝陵墓和神道石像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和考证,而且保存有若干珍贵的石刻图片、地图和手绘线图,这开启了一代学人探索南朝石刻艺术的篇章。

从民族文化特质来看,南朝陵前雕刻,整体呈现出中西方文化融合和对本土传统文化承续创新的两大倾向。从雕刻的风格类型和形态特征来看,南朝时期的陵墓石刻集合秦朝装饰写实风格和汉代雄浑写意的风格特点,既有严谨写实性、华美的装饰化,还有雄浑气象。同时,造型风格还吸收了国外传统雕塑的特点,尤其是亚述和波斯帝国的美术特色。南朝陵墓华表的装饰纹样与罗马的古典柱式同构性极强,此外,石刻碑座、华表柱额和莲花图形等与佛教经幢的相似性极高,这体现出印度佛教在东传中土的过程中对南朝石刻的影响也十分深远。石兽雕刻大多配有两翼,呈现出理想化和神性化的色彩。现有石兽雕刻历史遗存,从南朝刘宋刘裕的初宁陵神道石刻到陈文帝陈蒨的永宁陵石刻,跨越千年,横贯时空,随社会历史的变迁,由庄严的陵寝园林走进当下田野、公园的人民大众生活之中。南朝陵墓石刻在形制上呈现显著的装饰民族化、折中调和化和中外融合性三个特征。

(一)装饰民族化

与前朝相比,南朝陵墓石刻造型夸张,体态丰腴,遒劲有力,装饰民族化特质显著。夸张的造型,装饰的纹样凝聚着独特的东方神韵,给人们以强烈的视觉震撼。一尊尊矗立于王侯陵寝前的石兽昂首挺胸、阔步前行,躯体略呈“S”形,肌肉丰硕结实,体态健硕而富有张力,呈现出东方文化中的精巧、刚强的一面。整体上看,南朝石刻随着朝代的更迭而逐步走向大规模发展路径,在类别上呈现出多样化趋势。直至南陈中后期,陵墓石刻的形制才逐渐转向小巧纷繁的纹饰化走向。与中国传统造型的其他艺术形式一致,石兽造型中线的表现性居于支配地位,线在石刻造型

中发挥了重要的功用,表轮廓、展体积、绘虚实,是南朝石刻重要的艺术表现单元。现位于丹阳市东北十七公里外鹤仙坳山岗南麓的修安陵石兽雕刻,置于南朝齐景帝萧道生墓前,东西相向对称陈列。两兽体量相当,东为天禄,西为麒麟,均有不同程度残损。两者均胸突腰耸,瞋目张口,凸显威严。麒麟总长达三米,周身均匀布满鳞纹图式,线条节奏展现工整、精细和反复的形态特征,装饰性、规律性和集群化特点突出,具有强烈的东方神韵。以中国传统绘画的线性表现为主导的民族化造型方式,极具象征性和表现型,独具东方意蕴和民族文化特质。南朝石刻将这种线的元素引入到了帝王陵石刻艺术领域,形成了南朝石刻装饰民族性的独特品质。在空间处理上,麒麟昂首挺胸,阔步向前,面部向左上方微倾,营造出一幅神气凌然、高视阔步的神态,突出气韵精神的民族化特征,这是南朝石刻的又一大显著特征。在中国人文理念中,乌龟是长寿和祥瑞的象征,狮身龟背化可谓别具匠心,具有深厚的民族情怀。在天禄臀部的处理上,将形体造型与龟背符号同构,极富文化意义与人文内涵,表达了石刻工匠融合多重元素并积极创新的构思,巧妙地将神兽塑造与神性长寿融为一体。

(二)折中调和化

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文化艺术发展史上重要的阶段,雕塑艺术先后经历“秦代装饰写实风”^{[8]34}和“汉代雄浑写意风”^{[8]62}这两个成熟时期。南朝陵墓雕刻在艺术风格造型和塑造技法上融合了秦汉两朝的风格特质,并在发展的过程中杂糅了西方和中亚等国外艺术样式,呈现折中调和的特点。在造型风格上,南朝石刻继承了秦代雕塑装饰写实的艺术手法,将狮虎等自然物象引入神兽的雕塑造型,在保留写实性的同时强调装饰性;同时,南朝石刻吸收汉代雄浑写意的雕塑风格,在保留严谨比例尺度和构成样式的基础上,融入写意性塑造,展现气魄宏伟的帝王气韵。但相较于汉代大刀阔斧式、不拘小节的造型方式,南朝陵墓石刻对石兽轮廓线条、四肢鬃毛等细节的刻画交代得更为完整,力图在秦代装饰写实与汉代雄浑写意之间寻求一种造型风格上的视觉平衡。现位于南京栖霞区十月村的萧景墓神道石柱是保存较为完好的一尊南朝石柱,由柱基、柱身和柱冠三部分构成。柱冠部分为一莲花圆盘,莲纹工整排列于圆盘周围;上端居中置一辟邪,作昂首阔步状。柱身整体刻有纵向平直凹槽与罗马柱式类似,上部配以长方形柱额,上书“梁故侍中中抚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吴平忠侯萧公之神道”二十三字,为反体楷书,字迹清晰俊秀,笔力遒劲有力。柱基由两部分构成,上圆下方,两只螭首头头相接尾尾相连,环绕柱身两侧。石柱中辟邪、圆盘、柱额、柱纹和螭首等各部分装饰构成元素造型严谨有序排列,有秦代装饰写实之貌;两只螭首虚实相生,与柱身融为一体,有汉代随石赋形之感。

(三)中外融合性

南朝石刻雕塑创造性地融合商朝诡魅抽象风格和秦、汉等前朝古代雕塑造型风格与陵墓雕刻等特点,呈现折中调和的艺术特点。但其突出的艺术特征之一,还在于南朝石刻融汇中外美术元素的成功尝试。“考古艺术之以石狮为门卫者,古巴比伦及阿西利亚皆有之……然而中国六朝石兽之为波斯石狮之子孙,殆无疑义。”^{[7]68}对南朝陵墓石刻出现有翼兽形象的根源,目前学界尚存在诸多争议。根据现有资料,持“亚述说”^{[9]43}的占据主流,即有翼兽源于有着世界史上第一个军事帝国之称的亚述帝国宫殿内一些石兽的造型,后来经由波斯帝国传入中国。考察南朝石刻的图样造型,有翼兽的形象为舶来品确凿无疑,外来的双翼装饰造型与中华传统的云纹东方装饰元素融合,展现出中西方文化的融合与互鉴。具体到双翼的造型上,南朝石刻与波斯帝国亚述美术中的有翼兽张开双翼的程式化形态所不同,选取的是兼容并蓄,与兽身的整体形象融为一体的整体化造型,形成含蓄内敛而又蓄势待发的形体结构,这与中国传统儒家中庸思想的要求不谋而

合。上文所讲萧景墓神道石柱顶端的莲花圆盘纹样与源自印度的佛教艺术渊源颇深;柱身表面竖直的凹凸纹样也是对古希腊古罗马建筑文化艺术的吸收与借鉴;柱额中绘画与书法的融入,在拓展和丰富了石刻文化表现领域的同时,更是强调对本土文化的守望与创新,是民族文化精神的诠释。

南朝时期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是一重要的历史阶段,上接秦汉下启隋唐,为古代文化艺术发展的一大高峰时期。这一时期佛教盛行、文化繁荣、思想自由,再加上中外文化交流的扩大,都为南朝石刻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宗白华对这一时期有评价:“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想象力、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10]从魏晋风度到汉唐之气,南朝石刻的雄浑气韵达到了中国古代雕刻史上的一大高峰。

三、南朝陵墓石刻中外文化交流中的民族特征

关于中外文化交流,我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从两汉时期开始,由于丝绸之路的开辟,使得中外文化在宗教思想、工艺技术等多个领域内都发生了深远而广泛的交流。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出现了中外艺术交流史上的第一次高峰。与两汉相比,魏晋南北朝时期“丝路”沙漠路线的最大变化,是避开了异常艰险的白龙堆,另觅新途的努力得到了成功。新的丝路,一是经过伊吾绿洲到吐鲁番的路线更为顺畅,二是经“五船北”^[11]的新道成功开辟。《魏略·西戎传》:“道从敦煌玉门关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从玉门关西出,经横坑,辟三陇沙及龙堆,出五船,北到车师界戊己校尉所治高昌,转西与中道合龟兹,为新道。”^[12]这一时期,中国与波斯的来往进一步密切,文化交流亦更趋频繁,波斯曾多次遣使访问建康。《梁书·诸夷》载:“中大通二年,遣使献佛牙。”^[13]两国政府间的友好往来为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滑国国王给梁武帝奉献的方物中可见“至天监十五年,其王厌带蛮栗陁始遣使献方物。普通元年,又遣使献黄狮子、白貂裘、波斯锦等物”^[13]。就是在这一时期,中国富于神韵的绘画和雕刻传入了萨珊王朝,波斯绘画中的晕染法和联珠纹鸟兽纹样也传至南朝。富有萨珊艺术特点的有翼石兽经典造型,即是汉地工匠将西域艺术与传统石刻在融会贯通中,最终形成了端庄秀丽、生动传神的石刻艺术。

梁思成在《中国雕塑史》一书中即指出:“考古艺术之以石狮子为门卫者,古巴比伦及阿西利亚皆有之。然此西亚古物与中国翼狮之关系究如何。地之相去万里,岁之相去也千余岁。然而中国六朝石兽之为波斯石狮之子孙,殆无异议。至此以后,狮子之在中国,遂自渐成一派,与其他各国不同,其形制日新月异。盖在古代中国,狮子之难得见无异麟凤,虽偶有进贡自西南夷。然不能中土人人所见,故不得不随理想而制作。”^{[7]63-64} 林树中在《南朝陵墓雕刻》一书中,综合了朱希祖、朱偁、滕固和梁思成等学者的考察成果,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即:南朝陵墓的天禄辟邪石刻,其渊源应是波斯。《汉书·西域传》《集古录·跋尾》《后汉书·张让传》《后汉书·班超传》等都对波斯艺术传入中土及其应用有记载。虽然这些石刻名称各异,但石狮原型实为舶来品为不争的事实。不过,这种有翼神兽的雕刻,目前在中国可以上溯到在河北平山县出土的战国时期的中山国陵墓中的有翼神兽。但是,自汉代石狮(辟邪)之类的雕刻始,包括南朝陵墓雕刻,受波斯风影响当无问题。“只是一开始我们的民族并没有一切照搬,总是以本民族的文化为基础,再吸收外来的文化。”^{[9]40}

南朝陵墓神道两侧的石刻,上承两汉下启唐宋,将它们与汉代陵墓石刻(如现存于陕西兴平县霍去病墓石刻中的马踏匈奴、跃马、伏虎、卧象、人与熊等)作比较,可以看出,汉代的石兽装饰比较大气浑然,南朝的石兽装饰比较含蓄繁复。总体而观,南朝石刻虽然由简到繁,但是并未失去两汉石刻生动雄伟的气韵。在石刻“艺术魅力”这一特定艺术价值定位上,陈传席认为:南京及

周边地区的南朝石刻,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艺术遗存之一。南朝石刻在世界范围内的知名度虽不及古埃及的石雕法老神像和狮身人面像(Sphinx),但其艺术魅力却毫不逊色。古希腊、古罗马雕塑造型固然准确逼真,但从艺术的感染力和气势变化等角度来说远不及南朝石刻。南朝石刻虽然从数量上无法与古印度的佛教造像相抗衡,但造型艺术的魅力表达则别具一格。“宽容一点说,南京及周边地区的南朝石刻可以和古埃及的神像、古印度的佛像、古希腊及古罗马的雕塑并称为世界四大雕塑艺术,但其艺术魅力居其首。”^[14]毫无疑问,南朝陵墓石刻的形成受到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影响。如果从更广范围的地域文明交流来看,包括南朝陵墓石刻在内的中国本土造型艺术不可避免地在中外文化交流互鉴中融合发展,形成兼容并包的汉地文化。对此,罗宗真亦认为“文化交流的艺术传播和发展,在中国是经过漫长道路的”。秦汉以来,内地持续不断地吸收外来文化,借鉴和发展外来的技艺方法,并通过民众的创造性实践而融会贯通,成为自我文化更新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魏晋南北朝,陵墓雕刻文化除传承本土固有的文化因素外,又由于海陆贸易以及宗教文化的传播,受到古罗马、古希腊、古印度等地区的造型艺术的深刻影响。“东西文化交流之频繁,以及中国北方云冈、龙门石刻的实物资料,就充分反映了这种东西融洽的迹象。”^[15]归根结底,南朝陵墓石刻经典造型的创造是在不同文化艺术持续频繁的交流中得以完成的,而文化艺术的交流又依托陆上丝绸之路的开通传递得以实现。

四、结语

南朝陵墓石刻历经宋、齐、梁、陈四朝,虽各具特色,但整体风格统一于南朝气韵的程式化夸张意象内。南朝石刻基本以狮虎为原型,强调有翼兽的王者形象,象征着帝王将相的崇高权威,表达了他们的文化诉求,通过陵墓石刻宣扬等级观念和秩序文化。同时,石刻将狮子、老虎、鸟翼等元素融合,石兽一般呈仰天长啸状,以艺术的形式诠释了传统道家思想观,也展现出了古代工匠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强烈的装饰化风格是南朝陵墓石刻的一大突出特征,在吸收秦朝装饰写实和汉代雄浑写意的基础之上,又融入商代诡魅的装饰处理手法,增加了石刻的历史厚重感。“南朝陵墓石兽在团块的体积上加装饰化的双翼,用线勾勒出鬃毛,更添一份超自然的魅力。”^[16]南朝陵墓石刻上承秦汉下启隋唐,于中外南北频繁的地域文化交流中,实现文化的交融与创新,以雕刻艺术的形式宣扬了帝王强烈的政治诉求,构筑了陵墓雕刻史上的一大高峰。

参考文献

- [1] 魏徵,等. 隋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3:673.
- [2] 萧子显. 南齐书·州郡志(卷十四)[M]. 北京:中华书局,1972:255.
- [3] 杜佑. 通典[M]. 北京:中华书局,1984:77.
- [4] 姚思廉. 陈书:卷五[M]. 北京:中华书局,1974:82.
- [5] 袁枚. 随园诗话[M]. 卷10-14. 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19:135
- [6] 张彦远. 历代名画记:卷六[M]. 杭州:浙江美术出版社,2011:101.
- [7] 梁思成. 中国雕塑史[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
- [8] 吴为山. 中国古代雕塑风格论[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7.
- [9] 章孔畅. 南朝陵墓石刻渊源与传流研究[M].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1.
- [10] 宗白华. 美学散步[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177.
- [11] 张星娘. 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四册[M]. 北京:华文出版社,2018:1035.
- [12] 王炳华. 从考古资料看丝路开拓及路线变迁[J]. 西域研究,1991(3):16-19.
- [13] 姚思廉. 梁书·诸夷[M]. 北京:中华书局,1973:815.
- [14] 陈传席. 文脉与文明:《南朝访古录:南朝石刻艺术总集》序言[J]. 创意与设计,2018(3):98-99.

[15] 罗宗真. 六朝考古[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101.

[16] 陈绳正, 冼宁. 雕塑与建筑[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 398 - 400.

The Stone Carvings in the Mausoleums of the Southern Dynasty and their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in the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SHANG Ro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3, China)

Abstract: The stone carvings of the mausoleums in Southern Dynasty were first discovered in Nanyang, Henan province, which later spread to Xiangyang, Hubei province, then to Jiankang (today's Nanjing), together with the transfer of the national cultural and political center. They are the combination of the rigid style of the Qin Dynasty and the freehand style of the Han Dynasty, while incorporating Persian and Buddhist cultural and artistic forms. They are the results of continuous and frequent exchanges between different cultures and arts, which are characterized by ethnic-specific decoration, artistic compromise, and integration of Chinese and exotic cultures. These carvings inherited the traditional arts of the Han Dynasty, while absorbing the artistic styles in Northern China and overseas, with extended themes, and enriched traditional techniques, exerting profound impact on the art of stone carvings of later generations.

Key words: Southern Dynasty; mausoleum stone carvings; artistic style;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责任编辑:王建霞〕